

文学交流史中的侨易语境

乔修峰

葛桂录先生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以下简称《中英卷》)洋洋洒洒六十余万字,梳理了自13世纪以来八百多年的中英文学交流史,在陈受颐、方重、范存忠、钱锺书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读来很受教益。作者史海钩沉,爬罗剔抉,编织了一张经纬相错的网。如果把时间看成一条横轴,中英文学分居上下,两者交流中的事件、人物、作品、意象、观念等要素便交叉成网。使这张网图案清晰,纹理细密,已相当不易,但更难的是把握网格中的空气,也就是文学交流史的语境。它不仅凸显了网中的点和线,也考验着网的弹性。

“侨易学”显然有助理解和考察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侨易现象。叶隽兄在《“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中将“侨”的基本意义(移动)与“易”的四种含义相结合,提出了“移易”四义,即移变、移常、移简和移交。^①这四个层面对理解中英文学交流史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大有裨益,其难点则在于对“侨入”、“侨出”语境的深度把握。这也是侨易学作为一种方法在实践中的难点,因为这个语境不仅是无形的、变动的,而且总是由阐释者自己来选择、建构的。

《中英卷》考证了许多里程碑式的“首次”。两国的文学交流始

^① 叶隽:《“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3—194页。

自英国。13世纪英国人在著述中首次提到中国和中国人；16世纪英国人首次提到中国文学；17世纪伦敦舞台上出现了第一个采用中国故事题材的戏剧；19世纪汉学家翟理斯写出了英语世界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相对而言，国人对英国及英国文学的了解则晚了很多。“英国”最早的中文译名“谿厄利亚”还是出自明朝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之手；国人第一次从汉语知晓英国信息的著作也是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所作；19世纪的《兰墩十咏》是最早用中文描写英国伦敦的古诗。更多这类信息可从该书附录的“中英文学交流大事记”中找到，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中国人第一次看莎士比亚戏剧演出是在1879年，莎剧第一次在中国上演是在1902年，中国最早的莎剧评论发表于1905年，在英国获文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子毕业论文写的是莎翁的《哈姆雷特》。

这些第一次显然是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节点，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这第一次以及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例如，葛先生很看重英国人对中国文人的认识，谈到17世纪威廉·坦普尔如何欣赏中国由优秀学者组成的政府，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如何赞赏中国的以才智取人，19世纪托马斯·卡莱尔又如何对中国的“文人当政”津津乐道。只是，由于这些内容被放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谈，我们对它们之间是否有关联看得不是很清楚，也不易把握这几位重要的英国文人在认识上的发展轨迹或谱系。譬如，卡莱尔是怎么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的？他对中国文人的认识，是受了之前的约翰逊影响（他将约翰逊视为“文人英雄”并经常在著述中引用约翰逊的观点），还是受欧洲大陆的歌德、伏尔泰等人的影响，抑或是受了与之交游的“中国通”的影响？这些英国学者对中国文人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文化的发展，又是否引起过我国学者的反思？这些问题显然都需要对语境的把握。

葛先生结合中国语境，指出“文人当政”模式是儒家学说最终被统治者选择为国家政治意识的结果：汉代以前出现过像秦代那样的“以吏为师”，靠外部制度和法律来治国；汉代以来则将儒家道德教育和

外在约束相结合，“以吏为师”变成“以师为吏”，最终道德教育及人格培养与官吏选拔逐渐合一，并成为一整套的制度，也即科举制度。^①这一点似乎不为卡莱尔所知，也似乎不是他特别关心的问题。他提出中国是“有才智的人居于高位”，针对的也是英国当时的社会弊病。因此，当时的英国状况，也就是“中国文人”这个观念的“侨入”语境，成了理解卡莱尔相关论述的关键。维多利亚时代常被史学家看作“改革的年代”，而涉及民主制度改革的“议会改革法案”^②更是标志性的事件，当时很多人将单纯的政治改革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卡莱尔常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批评者，但他那种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的语言风格，很容易让读者把这种批评误以为是否定。但实际上，卡莱尔只是强调不应过度迷信制度改革而忽略人的因素，不应只关注外在的、物质的方面而忽略内在的、精神的方面，不要以为改革制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卡莱尔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并非空谷足音，马修·阿诺德就曾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批判过“工具信仰”（faith in machinery）^③，其实也就是失去“目的”之后对“工具”的错误崇拜。卡莱尔将有洞察力的文人视为英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发现“目的”，纠正当时文化上的偏至现象。“中国文人”这个观念为卡莱尔的论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如葛先生所言是“从异域文明里”找到的“新的活力因子”^④。只是，卡莱尔对这个活力因子的“侨出”语境了解甚少，他更多地是根据他眼中的“英国病人”来想象这个活力因子的功效。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所面对的大多数英国读者对中国文人的实际状况同样不甚了解。

① 葛桂录：《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② 1832年，第一次改革法案得以通过，新兴工业城市从传统农业区手中夺得了较为公平的代表权，中产阶级的代表权扩大（工人阶级没有获得选举权）；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将选举权扩大到了城镇工人；1884—1885年第三次改革法案将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到农业工人，英国政体逐步民主化。

③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ed. by Stefan Colli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3.

④ 葛桂录：《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第120页。

可见，语境的把握，对中英文学交流史研究来说至关重要。有时看似作家的无意之笔，背后却可能是那个时代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感知到这些语境，也就触摸到了网格中的空气。例如，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在我国介绍较早，据《中英卷》所考，1915年11月《世界杂志》发表的《古今崇拜英雄之概说》是卡莱尔英雄崇拜论引进中国的开始。这一思想后来在国内学界得到较多关注，甚至可以在卡莱尔与英雄崇拜说之间画上等号。但如果回到“侨出”语境，不难发现，英雄崇拜思想的确是19世纪英国文化中的重要现象^①，却不是卡莱尔的创见，卡莱尔只是感受到了这一思潮并做了最为有力的表述。

当然，还应注意与此相反的情况，避免对语境的把握陷入过度诠释。《中英卷》在谈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作家作品中负面的中国形象时，深刻地指出了英帝国对当时中产阶级作家的影响，尤其是英国在道德、文化、种族方面所谓的优越性。书中引用了狄更斯《董贝父子》中那段著名的话，描写“董贝父子公司”完全是按照“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商贸体系”来看待整个世界，“地球是为董贝父子的买卖而造”，“江河湖海之所以形成，为的是让他家的船只驶向‘董贝父子公司’”。《中英卷》认为这段关于董贝极为夸张的自负的描写，反映了“19世纪中期英国小说家所特有的一种自负”。^②其实，这种自负主要还是人物的，也就是董贝们的。狄更斯反倒是要批评这种自负，讽刺这种自我/民族中心主义，揭示现代商业资本对人性 and 情感的扭曲。不能否认“帝国意识”对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还很明显，但也应区别对不同作家的影响程度，尤其是狄更斯等人的“批判现实主义”还形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自省和反思精神。

① 详见 Walter E. Houghton,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305-340.

② 葛桂录：《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第103页。

相对于中国文学在英国，我们对英国文学在中国的历史了解得更为详细。《中英卷》详细地梳理了 19 世纪以来理雅各、德庇时、翟理斯、韦利等英国汉学家对中国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但更详尽的还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对英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像狄更斯、王尔德以及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都有详细的专题综述，并提供了一些研究史上鲜有涉猎的资料。例如，书中提到 1934 年《国闻周报》上发表了题为《英国文坛新发现不列颠博物院秘档记——小说名家狄更斯夫人之泪史》的译述文章，介绍了狄更斯的情感经历，这在当时无疑是对外国文学动态的及时报道，即便放到现在，也是没有过时的话题。

有些现已成为研究热点的英国作家早期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还需进一步搜集资料，以期更全面地考察这些作家在“侨人”语境中受冷落的原因。乔治·艾略特就是一个例子。在清末、“五四”两次西学东渐的译潮中，尽管她的好友达尔文、斯宾塞以及与她同列“维朝三大作家”的狄更斯、萨克雷都被介绍到中国，她却一直没有拿到船票。《中英卷》发现，1911 年 7 月 26 日《妇女时报》刊有周瘦鹃《英国女小说家乔治哀列奥脱女士传》，认为这是“我国介绍英国女作家之始”。^①可能限于篇幅，书中没再提供更多评介，但仍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空间。乔治·艾略特的历史小说《罗慕拉》虽早在 1917 年就由美国传教士亮乐月译介到中国，但直到近年才有学者进行研究^②。其实，乔治·艾略特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并不乏知音，只是多为接触英文的师生。乡土作家废名在北大读书时颇爱《弗洛斯河上的磨坊》^③；《织工马南传》（上海启明书局，1939 年）的译者施瑛也在译本《小引》中说，“八九

① 葛桂录：《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第 340 页。

② 例如，宋莉华：《从〈罗慕拉〉到〈乱世女豪〉——传教士译本的基督教化研究》，《文学评论》，2015 年第 1 期。

③ 参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第 428 页。

年前在大学读书”时该书乃是英文课本。也许是性情相投，也许纯属巧合，乔治·艾略特的首位中国译者梁实秋，也是位比较保守的文人。他翻译了《织工马南传》，交由他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的新月书店出版，并认为这可能是“哀利奥特”第一部译成中文的作品。但这些初步的努力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多影响，以至于几年后商务印书馆重版此书时，还把小说作者名误印作“奥利哀特”。相比乔治·艾略特受冷落的情况，其原因更值得深思。侨入语境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的状况，或如郑太朴所言：“自去年‘五四’以来，一切寂然不动的中国思想界，忽如雨后春笋的勃发，于是‘解放’呀，‘改造’呀，‘社会革命’呀，种种声浪遍地都是，真可谓极一时之盛了。”^①他觉得，在这种种声浪中，惟有“无政府”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与幸福”。^②像乔治·艾略特这样看重传统、强调责任的作家，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从《中英卷》中还能看到，现在颇受冷落的一些英国作家早年间还曾得到过热捧。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世纪英国的先拉斐尔派诗人，如但丁·罗赛蒂和克里斯蒂娜·罗赛蒂兄妹、史文朋等。1923年的《创造周刊》上刊载了滕固的文章《诗画家D. Rossetti》，1926年的《学衡》上也刊载吴宓的《论罗色蒂女士之诗》等重要论述，1928年邵洵美发表了长文《D. G. Rossetti》并出版了译有罗赛蒂兄妹、史文朋等人诗作的集子。吴宓称克里斯蒂娜·罗赛蒂的诗“如湖光云影，月夜琴音。澄明而非空虚，美丽而绝涂饰。馥郁而少刺激，浓厚而无渣滓”^③。1928年但丁·罗赛蒂百年诞辰纪念时，《小说月报》、吴宓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邵洵美主持的《狮吼》都有系列纪念文章甚至“专号”。此外，朱维基、张嘉铸、袁嘉华、赵景深、茅灵珊等都有相关文章或译作发表。葛先生的详尽介绍令人兴奋，但也引起一些疑问：为什么当时国内学者对先拉斐尔派如此热衷，而后来却消沉下去？是

① 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94页。

② 同上书，第496页。

③ 转引自葛桂录：《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第391页。

环境因素,还是个人原因?从葛先生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也许与邵洵美、吴宓从英美留学归来不无关系。但他们为什么对先拉斐尔派的其他作家关注不多?主要是个人喜好还是受国外学界影响?

三

想到这里,我想提一下辜鸿铭。《中英卷》对王国维、林纾、文学研究会作家、创造社作家、新月派诗人、学衡派同仁在20世纪上半叶对英国文学的翻译介绍都有专门章节论述,但对辜鸿铭却着墨不多,大多散落在对卡莱尔、毛姆等作家的分析之中。辜鸿铭在文学交流史上是一个特例。对他本人来说,生在南洋,留学英伦,深受英国文学影响;后来得遇马建忠,心仪中国传统文化,又深受中国文学影响。就语境而言,他任教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影响了很多国内学子;又将《论语》、《中庸》等典籍译成英文,并多用英文著述,又在西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身上体现了中英文学文化的多重互动。

这种多重互动与叶隽兄所说的移变、移常、移简、移交等“移易四义”相合。辜鸿铭出生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十四岁前往英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深受19世纪英国文学和思想的影响,不像严复等留英学者那样在出国前就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和明显的救亡意识。单从“思想框架”上看,甚至可以说辜鸿铭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人,即便回到中国,也时而自觉、时而不自觉地用着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眼光和话语,这是他“移常”(移动却未有变化)的根基。他对19世纪英国那些“现当代作家”非常熟悉——包括卡莱尔、罗斯金、马修·阿诺德、约翰·亨利·纽曼、弗劳德(J. A. Froude)、华兹华斯等,如梁实秋所言,“先生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①。这位既通晓古典拉丁文、又熟知现当代英国文学的华裔青年已经用维多利亚时代文

^① 梁实秋:《辜鸿铭先生轶事》,宋炳辉编:《辜鸿铭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人的思想将自己武装了起来，文风也深受影响。同样擅长英文写作的温源宁发现：“辜之文，纯为维多利亚中期之文，其所口口声声引据亦 Matthew Arnold, Carlyle, Ruskin 诸人，而其文体与 Arnold 尤近。”^①也就是说，回到中国的辜鸿铭，其著述无论从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相似。当然，辜鸿铭在性情和文风上还与 19 世纪后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爱尔兰人王尔德神似，同样擅长曲言附会，喜欢强词夺理，好为奇谈怪论，批评起英国来尖刻诙谐而又不乏欣赏之情。尤其是传说的他与卡莱尔的师徒关系，虽然不能证其有，但也不能否认，辜鸿铭可能是当时国内最能领悟卡莱尔思想精髓的人。

而“移交”（移动导致变化）发生在辜鸿铭回到国内。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及欧陆游学结束后，回到南洋，在新加坡遇到路过的马建忠，“辜鸿铭前往访晤，一见如故，三日倾谈，竟使辜鸿铭人生观及生活方式作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即倾心响慕华夏文化，决定返回祖国，研治经史”^②。这是辜鸿铭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侨易事件”^③。他后来又入张文襄幕府，在总督衙门参谋时政，反思西学；并在“汉滨读易”，在读易草堂钻研中国典籍，浸淫国学。这对辜鸿铭的知识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文化的精深甚至使他有了皈依者的心态。中英文学开始在他思想中交汇、渗透、融合。据罗家伦先生回忆，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歌课时，谈的已经是“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和“洋离骚”。^④

词语交融的背后是思想观念的变创，生出了“移简”，即“移动中有变化，也有恒常的因素在起作用，可能发生碰撞、互动、交融等

① 温源宁：《辜鸿铭》（林语堂译），伍国庆编：《文坛怪杰辜鸿铭》，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8页。

② 王成圣：《突梯滑稽辜鸿铭》，伍国庆编：《文坛怪杰辜鸿铭》，第188页。

③ 这一点受了叶隽兄的启发。他将狭义的“侨易事件”界定为“对侨易主体发生重大的刺激和影响的事件”。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④ 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伍国庆编：《文坛怪杰辜鸿铭》，第14、15页。

诸种可能，但重要的则是导致简洁的原则性规律的产生”^①。对辜鸿铭而言，这个规律就是所谓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其相通之处远多于其对立之处。正因如此，他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到解决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良药。对留英学子辜鸿铭影响较深的是卡莱尔、罗斯金等人的思想，是一种文化与社会批评，反思西方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所谓文明的“进步”。在他开始潜心研读中国文化之后，发现维多利亚时代那些文人关于现代文明的忧思居然早在中国文化中就有了类似的表述，遂倾慕不已，开始借用英国文人的话语来表述中国文化。吴宓先生在《悼辜鸿铭先生》中分析得很透彻：

辜氏身受英国之教育较为深彻长久，其所精心研读之作者，为英国之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以及美国之爱玛生等。故其思想出严氏翻译西籍时之上。由吾人观之，辜氏一生之根本主张及态度，实得之于此诸家之著作，而非得直接之于中国经史旧籍。其普崇儒家，提倡中国之礼教道德精神，亦缘一己之思想见解确立之后，返而求之中国学术文明，见此中有与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爱玛生之说相类似者，不禁爱不忍释，于是钻研之，启发之，孜孜焉，举此中国固有之宝藏，以炫示西人。^②

这种“炫示”不仅使国人有了一种看待自己文化的新视角，也使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化。更有可能的是，辜鸿铭能搔着西方人的痒处，根本原因并不是罗家伦所说“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也不是赵凤昌所说“辄出西学以折西人”^③，而是用西方眼光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应对西方文明弊病的资源。这就是“移

① 叶隽：《“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第194页。

② 吴宓：《悼辜鸿铭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5月7日。

③ 参见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惜阴：《国学辜汤生传》，伍国庆编：《文坛怪杰辜鸿铭》，第18、142页。

交”，移动发生异质文化相交，使“文化体之间”产生互动。^①辜鸿铭更多地成了一个载体，他身上的移变、移常因素使他有了一种超越性的眼光，能够看到文化交流中的移简，并最终影响到移交，对侨入和侨出语境都产生了影响，在中英文学交流史上值得一书。研究兼有“移易四义”辜鸿铭，侨易语境显然是赋予这块文学交流史网格以生命力的气息。

中英文学交流史的写作，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仅搜罗史料就很不不容易，有时候不是史料太多，而是太少，甚至还有很多空白。有了资料，再甄别筛选，经纬成文，又要大费周章。葛桂录先生治中英文学关系十余载，从《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到这部中英文学交流史（2014），已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令人叹为观止。不过，感受着网格中徐徐而来的气息，也当想见作者背后的艰辛。

^① 叶隽：《“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第194页。